

美籍华裔慈善家群体:

捐助教育,从不含糊

孙少锋 高乔

侨界关注

在近期举办的“全球华人慈善行动——清华论坛”上,《“全球华人慈善行动”首期研究报告》发布。报告初步研究了中国慈善家与美籍华裔慈善家通过慈善贡献社会的创新方式,着重阐释两者的捐赠趋势、动因和影响。

美籍华裔慈善家作为一个群体,成为此次研究的重点之一。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以及在高等教育捐助方面的付出,正滋润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动提供可循之路。



图为美籍华裔慈善家赵锡成捐赠4000万美元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兴建的“赵朱木兰”中心,这是该校第一座以女性和亚裔美国人命名的建筑。

慷慨掷金 热衷教育

近年来,随着美籍华裔企业家实力的增强,美籍华裔慈善家的慈善行动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

目前,全美华裔人口约4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3%。美籍华裔进行的大额捐赠(100万美元以上)高达4.9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约占美国所有大额捐赠总额的1.2%,所占比例与其占全美总人口比例一致。截至2014年底,全美有近1300家美籍华裔基金会,比2000年增长了418%,是全美基金会增长率的近3倍。

据《“全球华人慈善行动”首期研究报告》,美籍华裔慈善家主要致力于拓展高等教育机会、推动医疗研究与科学创新以及支持文化艺术发展。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捐赠占美籍华裔慈善捐赠的主要部分。

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百万美元捐赠名单显示,2008年至2014年,美籍华裔大额捐款中的66.4%流向高等教育领域。其中,美籍华裔慈善家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普利希拉·陈和马克·扎克伯格向旧金山公立学校捐赠1.2亿美元,这两份巨额捐款直接提升了美籍华裔慈善家捐赠的总体规模。

“美国具有成熟完善的慈善激励机制,美籍华裔慈善家通过捐赠高等教育,既能满足自身承担社会责任、体现自身价值的内在需求,又能获得政府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清华大学华裔研

究中心副主任邢菁华指出,美国的慈善激励机制为慈善家的捐赠行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环境。

回馈传统 融汇中西

“捐赠高等教育是全世界慈善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历史上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在接受本报采访中指出,美籍华裔慈善家热衷捐赠高等教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教育双重影响的结果。

美籍华裔慈善家大多接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认同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视教育的理念;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看重教育对个人、对社会、对全人类的价值,相信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价值与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十分重视慈善项目的综合评估、持续影响力和社会效果,希望在自己有能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给予捐赠,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捐赠高等教育恰好体现出他们渴望的影响力与价值追求。

“教育为一个更好的未来奠定了基础。”SupChina创始人、总裁郑安澜将自己对教育的捐赠归因于她相信教育的力量。2013年,郑安澜在哥伦比亚大学捐赠400万美元,并发起创新教育项目——“面向历史和我们”,通过网络传播帮助美国学生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促进包容性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她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关注教育,教育是可以改变国家民生的百年大计,然而高等教育花费很高,对于那些成绩优异、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她愿意

捐赠他们,助力他们的人生发展。

据“全球华人慈善行动”项目研究发现,就美籍华裔慈善家而言,最常见的两个捐赠动因是行业兴趣和个人从属关系,其中一个基于种族血统的从属关系进行捐赠的常见领域就是高等教育。

众多美籍华裔慈善家都优先支持中国学生接受全球教育,例如冯国经、冯国纶两兄弟出资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赵锡成博士一家为纪念赵朱木兰向哈佛商学院捐建高级管理培训中心,培养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段永平和刘昕夫妇向俄亥俄大学进行了大量捐款,以支持中国学生在传媒领域的求职和创业。

美籍华裔慈善家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中国需要适应并引导全球化进程,而高等教育对中国培养全球化人才至关重要。

关注中国 互学互鉴

“美籍华裔慈善家的慈善行动对早期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在许多高等教育项目上也发挥了示范作用。”卢德之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慈善事业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热衷高等教育捐赠这一特点也非常突出。

美籍华裔慈善家的慈善行为,突出捐赠人的个人意志与价值取向,更多地考虑到了捐赠项目的特殊性意义,针对性、专业性、集中性很强,比如捐赠高等教育中的留学生领域、新兴科技领域、标志性校园公共设施等。

中国国内慈善家则更为注重普遍

性,强调普遍受益原则,希望让更多人从捐赠中受益,从而更好地完成高等教育,比如捐赠贫困大学生、校园建筑等;同时他们也注重自己的捐赠行为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紧密结合,比如与国家扶贫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教育扶贫,体现了政府、社会、民间的统一性、协调性。

卢德之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全球华人慈善行动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美籍华裔慈善家与国内慈善家的交流机会将更多,交流机制也将更灵活,更有条件展开广泛的合作。与早期美籍华裔慈善家起到的引领示范作用不同,现在美籍华裔慈善家与中国国内慈善家是平等对话、互相学习的关系。

“如今,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开始尝试慈善合作,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慈善项目,这种现象在美国并不常见。”邢菁华说,随着中美慈善事业的交流沟通日渐频繁,中国慈善家与美籍华裔慈善家通过分享经验、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

目前,美籍华裔慈善家的慈善行为正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除了对高等教育的捐赠,医疗健康、文化艺术正成为美国华裔慈善家积极尝试的慈善领域,根据慈善家自身兴趣进行的捐赠也在不断增加。与之对应,中国国内慈善家在热衷高等教育捐赠的同时,对医疗科学领域的捐赠兴趣也在提升,慈善行为的发展正日渐与海外慈善界对齐。

“全球华人慈善家一定会更好地走到一起,用慈善的力量,共同为促进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更好地发展助力。”卢德之说。

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

龙登高

十几年前我在耶鲁、哈佛、剑桥大学访学期间,发现在它们的校园里都有香港华商捐赠的大楼、图书馆或冠名的机构。后来在伯克利、斯坦福、牛津等名校也看到香港华商的捐赠与慈善项目。清华、北大与国内高校亦随处可见港澳华商的善举。这些慈善家对于教育事业的捐助,令人由衷敬佩。

华商的事迹,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中国内地富豪近年在慈善事业上的建树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但相比之下,捐赠动力仍有所不足。一是因为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创业与成长的,真正具有捐赠能力的富豪新世纪以来才大量出现,事实上近年来富豪的慈善行为越来越多。二是“剥削”“仇富”的社会心态抑制了富人们慷慨解囊。三是慈善激励机制不健全。在某种程度上,慈善就是将社会剩余以税收形式集中于政府,转变为以捐赠形式分散于社会,因此有些国家对捐赠资金是免税的。中国还处于转型期,目前主要以政府官办慈善机构配置慈善资源为主导。四是慈善的基础有赖于社会、市场与民间力量的发育。

至今仍有一种主流思潮认为传统中国缺乏民间自组织机制与能量(如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所言),因此民间慈善基础薄弱。这是一种以今古的论调。

事实上,最晚从宋代开始,民间组织的善堂、救济机构非常普遍;私塾、书院则承担了主要的基础教育乃至部分高等教育,甚至“千古奇巧”武训也能利用金融市场、地权市场、法人产权与理事会制度兴办义学。各地广泛存在的义渡、桥梁、茶亭、道路乃至水利设施,也都是民间自发组织建设的公益事业。我刚完成这一研究,为此深深感动,亦颇多感触。在民主推选、自愿奉献的基础上组成的理事会(首事、首士),募捐筹资,兴建公共工程,定期维护;这些组织拥有法人产权属性的土地与资产,拥有可以增值的基金会(会金),因而奠定了公益事业独立存在与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制度支持。一些公共设施经久不衰。更不用说,在基层发挥重要作用的家族、士绅及各种“社”、“会”,普遍存在于工商业、金融市场、娱乐体育等领域,从不同层面组织、经营管理着民间事务,并与政府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种朴素的民间自组织制度,既是历史上慈善与公益的承担者,也为中华慈善传统奠定制度基础,提供经济支持,营造社会氛围。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对慈善文化的传承,也表明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华人在海外重建了各种文化认同与社会网络,以华商与侨领为核心形成了各种华人社团,组织多种活动,互帮互助,处理群体内部事务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包括血缘纽带的宗亲会,地缘与方言纽带的同乡会馆,以业缘为纽带的商会,以信仰为纽带的各种宗教团体等。

“达则兼济天下”,成功华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不仅承担着华人社会的公益与公共事业,而且反哺当地社会,或回馈家乡与祖籍国。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各地的华文教育就是他们自发组织而发展起来,形成华文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体系,却不需要当地政府出一分钱一分力。海外华人社会形成了富有生机的自发秩序与内在活力的自生机制。

华商弘扬中华慈善文化,彰显社会责任与情怀,对世界繁荣与和平贡献卓著。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华侨华人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马秀秀

“华侨华人具有独特优势,是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天津市侨办副主任房靖彪如是说。

“2018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将于本月13日亮相天津。日前,房靖彪接受了中新社记者采访。

自2009年举办以来,“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已成为天津的独特品牌。今年,会议共吸引了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位嘉宾与会,其中包括众多知名侨商、海外华媒代表、创新创业人士等。

“2018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除举办天津论坛外,还专门设计了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会、“侨梦苑”建设发展论坛等7个分论坛。“分论坛议题主要就是项目的对接和洽谈,包括人才引进的对接洽谈。”房靖彪说,这为广大华侨华人投资创业搭建了平台。

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天津海陆空交通便利。自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泰国正大集团、香港世茂集团等在内的诸多知名侨资企业,纷纷来津投资或设立公司。在天津引进外资中,侨资份额常年占据着半壁江山。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天津自贸区运作越发成熟,天津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侨资企业入驻。

“华侨华人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房靖彪说,作为连接中外的天然纽带,华侨华人借助其独特优势,成为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4年11月,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全国首家“侨梦苑”正式揭牌。围绕为侨、利侨、护侨、惠侨、聚侨宗旨,天津“侨梦苑”汇聚全球侨商侨领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驱动。截至今年4月,天津“侨梦苑”共聚集侨资企业400家,引资到总额270亿元(人民币,下同),年税收达到9亿元,现已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侨商和海外归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逐梦发展的热土。

房靖彪说,一直以来,天津市政府、市侨办对海外华侨华人都十分关心,更不断为华侨华人来津投资创业改善政策环境,“包括入关、落户、完善华侨华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等,都旨在为华侨华人来津投资创业做好服务。”(来源:中新网)



旅日艺术家吴汝俊

让京剧演出“国际范儿”

马秀秀

华美靓丽的舞台服装、美轮美奂的声光电舞台效果、巧妙融合的交响乐与电子器乐……难以想象,这些元素会出现在京剧表演的舞台上。而开创这一表演形式的,正是旅日艺术家、日本京剧院长吴汝俊。

旅居日本20余年,吴汝俊让中国京剧演出了“国际范儿”。

“世界性的人物设定、中国化的人物故事、京剧的艺术形态、国际化的音乐理念。”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吴汝俊如此描述自己的艺术理念。

从小,吴汝俊就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1963年,吴汝俊出生于京剧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作曲家、京剧演奏家吴乐常,母亲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吴凤楼。

在浓厚的艺术氛围熏陶下,吴汝俊4岁学戏,9岁

学琴,21岁以13门功课全优的成绩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国家京剧院工作。

彼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带来海外流行文化,让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受到冲击。“有时候,台上表演的人比台下的观众还多。”吴汝俊开始思考,如何将观众吸引回剧院。

在这一想法驱使下,他不断探索中国传统艺术与流行元素结合之道,开创性地将京剧与国外电声器乐结合,将广受年轻人欢迎的伦巴、迪斯科、探戈等曲调加入,将传统曲牌重新编排,同时融入小夜曲。

1984年创作开始,1985年作品出炉。几乎在一夜之间,吴汝俊创新的京剧轻音乐遍布大街小巷的歌舞厅以及各种演出中。

1989年,吴汝俊到日本发展。在日本,他与妻子

云南风情绽放爱沙尼亚



近日,在爱沙尼亚东南部沃鲁镇,中国云南金凤艺术团演员在沃鲁民俗艺术节“中国民俗日”活动上为观众表演节目。

郭春菊摄(新华社发)

陶山昭子共同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日友好交流而努力。“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我把中国人和平、善良、仁爱的思想融入艺术创作中,让不同国家的观众通过艺术,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吴汝俊原创京剧轻音乐金碟100多首曲目,广受日本观众喜爱。此后,吴汝俊一边在日讲学,对比世界艺术,一边掀起了新京剧创作热潮。

广泛吸收京剧各大流派所长,他将昆曲、西洋乐等多种艺术元素加入传统京剧中,从而创作出独特的“吴氏青衣”唱法;在传统唱腔与叙事方法基础上,他又借鉴国际流行文化元素,并辅以现代化声光电舞台效果,创新推出老少皆宜的“吴氏新京剧”。

其中,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京剧《贵妃东渡》,作为北京市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献礼节目,广受赞誉;他用新京剧演绎的《则天大帝》,从14岁的武媚娘演到83岁女皇,跨越花旦、青衣、小生、老生、老旦,开创舞台演出先河;2016年,吴汝俊创作的新京剧大戏《爱心观音》,以观音菩萨的成佛历程为故事内核,表达了爱人、爱苍生、爱世界的大爱精神……

吴汝俊认为,惟有创新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走向世界,“而身体力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每一位身处海外的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来源:中新网)